三秦印记

# 携手共建十余载 国际合作硕果丰

## ——我与“一带一路”旱区农业合作的故事

□ 罗军

2013年秋，国家主席习近平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自此，这个根植于历史厚土、被誉为21世纪伟大新故事的“一带一路”就迎风生长，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2014年以来，我担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大”)副校长，分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西农大长期坚持走国际化办学道路，先后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153所大学与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考虑到学校位于丝绸之路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和聚焦旱区农业的科教优势，无独有偶，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同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因此，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旱区农业合作与交流大有可为。此后，学校组团访问了中亚、中东、中东欧等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主动“走出去”，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旱区农业合作与交流。2016年11月5日，我们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吸纳了来自12个国家的59家科教单位和农业企业成员，截至目前，已有19个国家的130个成员单位加入该联盟。为做实做强做好联盟工作，我们针对中亚国家的农业生产特点，结合西农大科教优势，以提高小麦、玉米、油菜、苹果等主要农作物产量和推广节水农业技术为切入点，系统规划，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与交流工作。率先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设6个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服务国家战略，明确建设目标，发挥技术、人才培养与产学研用密切合作优势，助推我国农业“走出去”，服务沿线国家的农业发展，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探索“西农方案”。

西农大农学院专家教授积极参与海外农业示范园建设，利用粮油生产方面的专业技术优势和熟悉粮油企业的产业合作优势，与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公司等企业洽谈合作，西农大负责作物新品种选育、绿色生产技术研发等产业链前端环节，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公司负责订单收购仓储和物流加工等中后端环节，形成完整产业链。2017年9月5日，西农大与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共建北哈萨克斯坦农业科技示范园。学校与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公司深度合作，以哈萨克斯坦北部科克舍套为核心示范区，大规模推广小麦宽幅沟播等绿色高产技术，小麦、油菜等作物与当地品种比较，最高增产60%，在哈萨克斯坦开创了年均150万亩的订单农业新模式，目前已建成10万吨面粉加工厂、30万吨油脂加工厂和百万吨级粮油物流集散中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功推进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工作，为提升区域粮油产业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示范样板。总结与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公司合作的成功经验，西农大探索建立的“科技引领、企业主体、多方协同、市场导向”的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新模式，为中亚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绿色增产增收提供了“西农方案”。

在农学院积极推进作物育种生产相关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同时，动物科技学院、园艺学院、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也在畜牧兽医、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和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相继建成了中哈畜牧科技示范园、中吉果木良种繁育技术示范园、中乌节水农业科技示范园、中哈盐碱地治理与农业利用科技示范园、中塔数字农业装备科技示范园、中巴(巴基斯坦)生物健康农业科技示范园、中白(白俄罗斯)农业科技示范园等7个高水平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其中，中白农业科技示范园选育的小麦新品种“西农198”已进入白俄罗斯小麦品种适应性评价程序。

“西农198”小麦品种历经5年联合攻关，从首批播种到进入国家审定程序，集中体现了西农大“国际化战略”框架下的系统性布局。2024年，中白农业科技示范园获批“中国-白俄罗斯农业现代化科技小院”，成为中欧农业科技合作的标杆。更令人振奋的是，在白俄罗斯国际农业机械与技术展览会上，西农大凭借在旱区农业领域的卓越创新与丰硕国际合作成果，一举荣获“金牌获得者”及“最佳参与者”2项重量级荣誉，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认证。”白俄罗斯农业部高级官员竖起大拇指赞叹：“中国方案让欧洲土地焕发新生机。”

2025年7月初，我率团访问中亚和白俄罗斯期间，白俄罗斯国立农业科学院副校长尤里·季别茨向我展示了由西农大研发的抗旱播种机在白俄罗斯播种的视频，指着发布于当地的两项作物栽培技术国际标准说：“这些成果让中国智慧真正融入了白俄罗斯农业现代化进程。”当看到“一带一路”农作物新品种与新技术(白俄罗斯卷)的成果展示时，我更加确信：这是中国农业科技标准“走出去”的生动实践，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样板。通过国际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农业科技示范园从单一技术输出向标准共建、产业融合升级，让中国农业科技在欧亚大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范式。这些突破性成果不仅标志着我国旱区农业技术体系的国际认可度显著提升，更彰显了我国在农业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跃升。

短暂的中亚和白俄罗斯之行结束了，在回国航班上，我毫无睡意，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随后，我翻开当时拍摄的考察照片，思绪万千、十分感慨。回想起十年来，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旱区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高原，从巴基斯坦的旱原到白俄罗斯的黑土地，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建成了8个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和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分校，也结交了数以千计的朋友，收获了各国人民的真诚和友谊，这正是落实国家《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科技合作倡议》的具体实践和陕西作为。西农大是中国旱区农业的“国家队”，西农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为‘一带一路’建设多做贡献”的嘱托，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勇担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重任，创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展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

**(作者系省政协常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副校长)**



# 记忆皱褶里的光

□ 郭妮妮

改革之潮涌来，初时不过是细流，悄然渗入街巷，浸润了人们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大潮无孔不入地渗进每一个角落，而作为“80后”的我，便在这大潮中生长，衣食住行皆刻着时代的印记。

## 一

我出生于1982年，我家姐弟三人，父亲是粮食系统工人，母亲虽不识字，但对我们三人的学习要求很严格。记得当时我和姐姐一块上学，我上铜川师范，姐姐到西安上中专，弟弟还在上小学，而家中只父亲一人有收入，真的有些捉襟见肘。亲戚及邻居都对父母亲说：“女娃能识字就行，花这么多钱上学，迟早都是要嫁人的，是别人家的。”母亲说：“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女娃男娃都要学有本事，以后在社会上才能养活自己。”我和姐姐也很懂事，上学期间很节俭。我上铜川师范当时是包分配的，学校也补助三年的生活费，上学期间几乎不买新衣服。我在家排老二，上面有姐姐，从小就一直穿姐姐的旧衣服，粮食大院好心人也会给我们一些旧衣服，我和姐姐挑一些穿上，感觉也不错。我最早的服饰记忆，是母亲缝制的背带棉裤。为了保暖，母亲总是把裤腿做得格外肥硕，像两个面口袋。背带是可以调节长度的，裤脚通常是收口的，针脚密而匀，所有的接缝处，母亲都会反复地来回缝好几道线，这样才能固定住棉花不走形，耐磨又耐穿。母亲很勤快，冬天会给我们做棉鞋，亲手纳千层底，底上用一层布再包上一层棉花，鞋面里也是包裹着棉花。因为包得厚实，所以做出来的鞋子显得特别大，当时小小的我穿着母亲做的棉衣、棉裤、棉鞋，被裹得像一只圆滚滚的小熊，那种包裹全身的、妥帖的感觉，足以温暖一生的记忆。

## 二

食之一道，更为昭彰。幼时餐桌上，咸菜、萝卜是常客，肉腥、糖果尚待年节。每逢过年，父亲才会割一些猪肉，肥的多、瘦的少，肥的炼油，瘦的炒菜。母亲将肥肉炼出的油盛在搪瓷缸里，炒菜时小心地舀一勺，满屋生香，尤其是煮肉的汤泡馍最为好吃，肉汤极鲜极浓，馍块吸饱了肉汤，软糯肥腴，入口即化。我们姐弟围坐桌前，双手捧碗，浑身暖透，吃得倍儿香，觉得世上至味，莫过于此。

1997年我考上铜川师范，第一次出门求学，现在看来并不远，但对于当时从没出过远门的我来说感觉好远，铜川师范原址就在现在的铜川市第一中学北关校区后面，上学期间我们和市一中还共用一个操场。师范的食堂位于校舍之南，菜式总是固定几样：白菜炖粉条、酸辣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

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周三下午学校会做一次肉蒸饺。一到周三下午最后一节课，尤其是最后几分钟，我和同学们就感觉时间特别漫长。待下课铃声一响，我们紧握饭票和碗筷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向饭堂冲去，有时排到前面能买到心心念念的蒸饺，有时虽然排到面前但蒸饺早就卖光了，我们只能打些馍和菜。还有食堂后面有个小灶，其实小灶就是几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只做油泼面，要吃油泼面我们需要早早地把碗放到小灶上，下课后排队去取，有时自己的碗会被别人拿走，为了吃油泼面也不知丢了多少个碗。

而今思之，那时的食堂菜未必佳、米未必精，却偏偏在记忆里熬成了最浓的羹汤，那大锅菜里，竟吃出了整个青春的滋味。

## 三

我们老家有两间砖窑，我上小学的时候随着父亲一直在粮食大院长大，我们一家五口住在瓦房里，挤在一张大床上，墙面是土坯，每年过年都用报纸把墙面糊一下，顶棚也要用报纸糊一下，母亲用面和成糨糊，用荞麦秆绑成刷子把面糊刷到报纸上，母亲站在桌子上的凳子上，一手提报纸，一手拿一把干净的笤帚一扫，将整张报纸平整地贴上去。姐姐扶凳子、递报纸，我就在下面刷报纸。以前的读本少，我们就看一看、读一读贴在墙面上的报纸。因为是瓦房，在雨季的时候家里经常会漏雨，雨滴从看不见的黑暗高处坠落，带着瓦片缝隙里积年的灰尘气息，精准地找到床铺、地面，还有屋角四处接雨的搪瓷盆里、瓶瓶罐罐里……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住到了平房里，两间房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我和姐姐睡单人床。我家也买了一台黑白电视，看电视要在房顶架天线杆接收信号。当时我们最喜欢看《西游记》。刮风下雨都会使房顶的天线杆偏离方向，所以父亲经常要到房顶上举着天线转圈校正，那时的电视信号时好时坏，父亲在上面摇着喊道：“咋样，有图像吗?”我们几个孩子盯着打开的电视机的雪花点喊道：“没有，没有。”父亲转动方向又问：“有没有?”我们看到滋滋啦啦的电视上有了一点声音便喊道：“有了，有了一点声音。”父亲再慢慢调整，图像和声音更清晰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几个一喊，父亲便用石块和绳子把大杆子固定好。

如今思之，那转动天线信号的岁月暗含了人生之理：完美难得，需得不断调整和寻觅；清晰易逝，应珍惜当下每个瞬间。

## 四

2000年我从铜川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五里镇中心小学教书。当时我带的是六年级学生，十八岁的我站在讲台上教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认真备课、用心上课，积极参加省市县组织的各项活动和竞赛，一步步在乡镇小学得到历练和成长。回想起刚工作时，我和同学两人住在一间窑洞里，我们最苦恼的是生炉子做饭的问题。家中母亲特别勤快，而我一直在上学读书，所以不会生炉子也不会做饭。尤其生火炉时，先把炉子掏空，准备纸，将纸点燃，再放柴火，不知是柴火放得过早还是过迟，不是纸烧完了柴没点着，就是纸上的火被柴压灭了，有时柴火终于着了，把煤炭往炉子里一放，火又灭了。经过多次后，我终于学会了生炉子。六年级学生毕业后我从一年级开始带学生，冬天的时候我会早早到教室给孩子们生炉子，孩子们一到教室就感觉暖暖的。2005年，我依然在五里镇中心小学教书，但已住进了楼房，虽然也要生炉子，但住的条件好了许多。2008年，我住进了有暖气的楼房，再也不用生炉子了。2012年，我通过省公务员考试到宜君县安监局工作。听学校老师说，我离开后，教师周转房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住宿的条件越来越好。

## 五

行路之难，见证时代变迁。父亲有一辆“飞鸽”牌二八杠自行车，铃铛总是锃亮，车的横梁上曾先后坐过我们姐弟三人。他骑车上班，风雨无阻数十年，那辆车成了他的老伙伴。

后来我参加工作，周末常坐班车往返于家里与乡镇。结婚后，我把摩托车换成了小轿车。如今出行更方便，假期我带上家人坐着高铁或者飞机外出旅行。

2012年，我来到县城工作，那时我的孩子已经六岁了，父母、姐弟，还有我们，都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大家陆续也买了小汽车，家电不断智能化，日子越来越好。转眼间已是2025年了，我家的孩子和姐姐家的孩子已上大学，弟弟家的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幼儿园，父母亲身体康健，回头想起来，还是时代好呀。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亲历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亲眼见证了一座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贯通南北，从凭票供应的年代到商品极大丰富，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进入千家万户，从“走出去”的渴望到共建“一带一路”的宏大格局。

## 六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作为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我充分感受到了在改革开放中祖国的不断繁荣昌盛，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些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生活皱褶里，藏着改革开放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印记。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次褶皱的展平都是时代的进步。我是被改革开放重塑的一分子，生活的每一道皱褶都深深地烙进我的生命肌理。如今回望，那些皱褶里透着光亮，照亮了一代人成长的路径。

**(作者系铜川市政协委员、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主任)**

文史馆的故事

# 一面国旗的“归程”

## ——曾联松签名国旗入藏记

□ 任强

展柜的灯光柔和地打在那方红绸上，映出三个墨迹沉稳的大字——“曾联松”。这面国旗，不是普通的国旗复制品，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亲笔签名、亲手缝制五角星的珍贵文物。

2024年9月，它从浙江嘉兴跨越千里来到陕西西安，成为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的入藏文物。它的“归程”，牵出了一段跨越75年的红色情缘，也见证了一位老党员、一位文博专家和政协文史工作者共同守护红色记忆的初心。

2024年春，在全国文博系统的一次交流活动中，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茆梅芳与浙江东方博物馆馆长董利华相遇。两人谈及馆藏，董利华提到自己珍藏着一面由曾联松亲笔签名的五星红旗，还有一本1945年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印制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茆梅芳听后，眼前一亮。作为全国革命文物百佳讲述人，她在延安从事文博工作多年，深知这两件文物的分量。她对董利华说：“老董，这两件文物，最应该去的地方是陕西。延安是人民政协制度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如果能回到那片红色土地，意义非凡。国旗和人民政协的关系，就是一段‘协商建国’的佳话。1949年，五星红旗正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选出来的，没有政协这个平台，就没有那面凝聚共识的国旗。”

“再说七大和政协的关系。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统一了党内思想、明确了前进方向。而人民政协的使命，就是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团结到这个方向上来。从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到后来的政协会议，这是一脉相承的。”

“两件文物回延安，就是回到人民政协制度的发源地，回到协商建国的初心起点。在‘两个75周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让它们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见证从延安走向北京的光辉历程。”

这番话触动了董利华。他是一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从泥瓦匠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建筑行业鲁班奖获得者，他的人生轨迹与改革开放同步。但他最引以为傲的身份，是浙江东方博物馆馆长——这座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的创办者。

在茆梅芳的牵线下，董利华与陕西省政协文史馆取得了联系。

2024年9月24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浙江东方博物馆。陕西省政协副秘书长郭占华、文史馆馆长任强一行专程赶来，参加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捐赠仪式。

董利华小心翼翼地展开那面珍藏多年的国旗。国旗长1.6米、宽1.2米，红绸质地。“曾老告诉我，他不是专业的设计师，只是一个普通的投稿人。这面国旗上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他对新中国最朴素的情感。”这面国旗是曾联松晚年赠予董利华的。董利华回忆说，他得到这面国旗后，一直珍藏在馆中。如今他将自己30多年收藏的10多万件红色藏品全部拿出来，自费布置“日耀东方”红色展览，这面国旗就放在开篇最显眼的位置，“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我希望它深深烙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董利华说：“(这面国旗)交给陕西省政协文史馆，交给专业的机构保存和展陈，是我最放心的选择。让它们回到延安精神的发源地，是我的心愿。”

与国旗同时入藏的，还有一本1945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印制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本党章，封面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磨损，但内页的文字依然清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本党章，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人民政协制度的发源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而国旗的设计者，正是时年32岁的上海青年曾联松。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曾联松看到后，心中涌起难以抑制的创作热情。他把自己关在闷热的阁楼里，画了又改，改了又画。他的老伴项佩瑜后来回忆道：“他晚上就钻到阁楼上写写画画，每天早晨我都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蜡光纸。搞了一个多月，也不知他忙什么。”

一天深夜，他仰望星空，“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中国共产党”这句沪剧唱词涌上心头。灵感如星火迸溅：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每颗小星各有一角正对大星中心，象征人民大团结。1949年8月中旬，他的设计稿寄往北京，编号“复字32号”。

1950年11月，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敬意。”

面对这份殊荣，曾联松始终淡然。他常说：“我不是设计者，我只是一个投稿人。国旗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协商的结果。”

如今，这面国旗静静地陈列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弦歌不辍 文史载道”展厅。每天都有参观者驻足凝视。有人在留言簿上写下“看见这面旗，就像看见了那个年代”。

自2023年9月开馆以来，陕西省政协文史馆已接待450批次万余人次参观者。文史馆充分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职能，让馆藏文物真正“活”起来。这面国旗的入藏，正是政协文史工作“挖掘”与“抢救”的缩影——从茆梅芳的热心牵线，到董利华的无私捐赠，再到省政协文史馆的专业守护，一条红色血脉在传承中绵延不绝。

这面国旗，承载了三重意义：它是新中国诞生的见证，是人民政协民主协商的成果，是普通公民爱国情怀的物化。它见证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诞生，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它传承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代代中国人对初心使命的守护。